

张治中在 40年代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及其亲苏政策

冯海燕

作者 冯海燕, 新疆大学政治系讲师; 乌鲁木齐, 830000

关键词 张治中 “三区革命” 新疆与苏联的关系

提要 1944年11月, 新疆爆发了反对军阀盛世才的“三区革命”, 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援。“三区革命”的主流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 但在革命前期也存在着民族分裂主义的情绪。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一向持亲苏不反共立场的张治中将军, 主持了与“三区”方面的和平谈判。他在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信任和斡旋下, 力主对内和平、对外亲苏, 较妥善地处理了与“三区”方面和苏联在新疆的关系, 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5年9月,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 主持与新疆“三区”方面的和谈。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 张治中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后, 他虽然辞去兼任的省主席职务, 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致力于新疆的和平与建设。这期间, 他正确制定了对内和平, 对外亲苏的两大政策, 力图找到一条使新疆长治久安的途径。

一、张治中赴新疆的背景

辛亥革命后, 北洋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亲帝反苏。大革命时期, 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又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遗愿。是年12月, 国民政府以苏方人员支持中共广州起义为由, 撤销了苏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1929年7月, 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最后导致中苏断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苏联提议中苏复交。在国内舆论压力下, 蒋介石政府于1932年12月与苏联复交。抗战全面爆发后, 中苏很快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从物质、人力和道义上给中国以大力支持。但是, 由于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投机性,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 它趁苏停止援华之机, 开始冷却及恶化中苏关系, 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支持新疆军阀盛世才由亲苏转向反苏。

30年代中期, 迫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 盛世才伪装进步, 亲苏亲共, 与苏联的关系比较和睦。苏联曾多次出兵扶持盛世才, 帮助盛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人民利益的较为进步的政策。1941年, 德国入侵苏联, 苏联在战争初期处于失利的困难境地, 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进入极端艰难的阶段。一贯玩弄政治投机的盛世才立刻投向国民党, 疯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同时还中断了新疆与苏联的边境

贸易,撕毁了和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迫使苏联撤走除外交人员之外在新疆的所有军事及技术人员。苏军曾以20辆坦克开进伊犁进行示威,盛亦命令其驻伊犁的军队严阵以待。1943年3月17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奉命通知中国政府,苏欲撤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工厂和独山子油矿的所有苏方人员及设备,并停止新锡公司^①的工作。

解放前,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生产所需品,绝大部分是通过以货易货的形式从苏联交换而来的。盛世才蓄意恶化新疆与苏联的关系,使新、苏贸易骤减,给新疆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混乱。新疆物资奇缺,盛世才横征暴敛,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新疆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趋严重。1944年秋,以“清枪”、“献马”^②为导火线,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的人民,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并在上述“三区”建立了革命政权。

新疆的“三区革命”是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的。如前所述,至1944年春,苏联“势力”从新疆撤离,中苏关系也降到了冰点。盛世才统治后期的所作所为,既严重损害了新疆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了与新疆有漫长边界线的苏方利益。被激怒的苏联开始酝酿一场援助推翻军阀盛世才的革命活动。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等地方均设有培训新疆人员的军事训练基地,出版并传回了各种反盛、反国民党的宣传品。1944年11月,“三区革命”爆发,苏联派遣陆军和空军给予直接支援。苏联波里诺夫率领的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部队,斯坎德尔率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骑兵更给起义部队以强有力的支援。

“三区”民族军一路势如破竹,1945年9月挺进玛纳斯河西岸,距迪化仅150公里。继盛世才之后来新疆主政的吴忠信料定军事解决无望,叠电蒋介石,祈求另速派军政大员。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率国民党中央官员数人,并带着蒋介石“去新疆研究解决‘事变’问题”^③的任务,飞抵迪化。

二、张治中与“三区”代表谈判的简要经过

抵迪化的当晚,张治中经与当地国民党军政长官对新疆的军事、政治、外交、供应诸多问题进行详细商讨后一致认为,从目前状况看,用军事办法解决毫无希望,用政治方式解决的最好中间人是苏联。第二天,张治中与苏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耶夫见面,对“伊宁事变”的解决达成共识:和平解决为上策。张治中请叶谢耶夫代为从中疏通,叶当即表示愿意。“三区”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并把这一愿望也通过苏联政府给予转达。这样,从准备到正式谈判阶段都是以苏联政府的代表为中介从中斡旋,和谈于1945年10月17日开始进行。

张治中与“三区”政府还未进入正式会谈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三区”和谈代表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都佩带“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④的证章,身穿绿军装,配星月肩章和勋章,要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身份,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张治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相让,坚持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事变地区代表谈判,并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谢耶夫从中疏解,代为转达。“三区”代表遂放弃原来的主张,这样谈判才正式开始。

由于双方观点殊异,谈判非常艰苦、缓慢,争论也十分激烈。这中间正式与非正式会谈不计其数。其间屡濒破裂,数经顿挫。由于双方的努力,又赖苏驻迪化总领事叶谢耶夫、萨维列耶夫的从中斡旋,历经8个月的谈判,终于使“伊宁事件”(即“三区革命”)获和平解决。在谈判过程中及以后在新疆执政的一年里,张治中始终坚持了自己在国民党内一向亲苏的立场,与苏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三、张治中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

张治中是一位开明的国民党将领。包尔汉这样评价他:“在我个人与他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他比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吴忠信高出一筹。”^⑤他所遇到的新疆社会、民族矛盾,比他的四位前任更为复杂和尖锐。但

是，他以“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责”这样一种气魄，在兼理新疆省主席后，就举起了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两面旗帜。他在详细、深入、客观地研究新疆问题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为了对内和平，一定要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给新疆各族人民以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二）新疆问题又是外交问题。新疆和苏联向来就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经济的种种密切关系。张治中认为，苏联对新疆无领土企图，但它绝不能容忍在新疆出现反苏的局面。他说：“我们必须和苏联保持亲善的关系，使苏联在国防方面得到安全，在民族方面得到和睦，在经济方面，保持平等互惠的关系，使双方得到平等互惠的利益。”“我们能够做到这点，才能确保新疆的和平，才能够确保新疆的永久和平。”^⑥

张治中在许多场合都敢于坚持并大力宣传自己的亲苏主张。1946年3月12日，张治中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新疆问题解决方案》的专门报告，谈了他对新疆国际环境的看法。他认为，要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对新疆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新疆和别的省份不同，应该从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教育、文化、外交各方面观察，决策才不致于失误。他是这样分析的：第一，新疆是一个孤悬塞外，距离中国内地非常遥远的省份。以当时的交通能力，从兰州到迪化坐飞机需8小时，坐汽车需一两个星期，中间有一大段路线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只靠一条破烂的公路维护交通。但是，新疆与苏联毗邻，苏与新接壤3000公里，向来就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从经济方面看，新疆宝藏实在太多。单就石油一项，北疆乌苏到奇台，南疆焉耆一带，遍地皆是。至于其它矿藏，如煤、铁、金、银、钨等，无一不备，有些未经科学勘测，有些迄未开发。更由于新疆和内地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内地的物资又极少运往新疆，一切日常用品无一不取自苏联。新疆当地人民吃的是苏联的糖，穿的是苏联的布，抽的是苏制的烟，使用的是苏制的家俱。大至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小至一个玻璃茶杯，无一不是同苏联发生关系。在经济上，新疆与苏联密不可分。第三，就民族来说，新疆有乌孜别克族，苏联有乌孜别克共和国；新疆有哈萨克族，苏联有哈萨克共和国。苏在中亚的5个加盟共和国，新疆都有同样名称的民族，而且是近邻。这些民族的国籍不同，但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无不相同。张治中犀利地指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是很复杂的，民族意识也很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大都憧憬苏联自治共和国的制度，内心隐藏着独立的企图。对此，他建议国民政府，承认以民族为本位的自治；新疆应按照各族人口的分布来划定省内各个民族自治区^⑦。

半个世纪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重读这些文字，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张治中先生的远见卓识。

四、张治中的亲苏政策

1946年7月通过的《新疆省政府施政纲领》是在张治中主持下拟定的。其内容分政治、民族、外交、经济、财政等九章。在外交一章中特别提出：“（一）切实增进中苏亲善；（二）促进中苏经济合作；（三）发展中苏文化与学术关系。”^⑧这些规定强烈地反映了张治中在新疆这个特殊环境下力主亲苏的主张。

如果说在对内和平问题上，国民党在新疆的上层人物中，有的对张治中的和平政策，由观望发展到动摇、反对，认为他太软弱，会断送新疆前程，但张治中毕竟还能控制得住局势。因为在新疆没有他的命令，不可能发动战争。为此，他坚决调换了强硬派首脑、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可是在执行亲苏政策上，张治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就更多了。先说南京政府方面，虽然他已经说服了蒋介石，在新疆绝不能采取反苏政策，但国民政府对外方面一贯奉行亲美反苏，政府中大多数人对张的亲苏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外交部的反对尤烈，张治中不时和外交部负责人产生激烈冲突。这是张治中甚感头痛的问题。

至于在新疆省内，亲苏抑或反苏也是激进和保守两派斗争的焦点。保守派当中很多是反苏的，而激进派则坚决主张亲苏。前者骂激进派为“外国的尾巴”，后者反讥前者是“汉人的走狗”。驻军将领中不少人也持反苏立场，经常制造纠纷，搞反苏活动。如喀什发生阻止苏领事馆人员出外购物、殴辱领事馆人员、反对当地人民为苏领事馆服务等事件。

在重重压力下,要想执行亲苏政策,困难确实很大。但是,张治中的决心非常坚定。他清醒地看到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国共两党是战是和,在新疆必须坚持亲苏政策。他表示,“只要我在新疆一日,就一日不变更亲苏政策。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被迫不能执行亲苏政策时,那我只有敬谢不敏,离开当时地位。”^⑨

张治中维护亲苏政策是不遗余力的。《新疆日报》曾转载一篇重庆《大公报》的社论《哀中共》,张看了后非常震怒,他说哀中共就是哀苏联。仅因转载这篇社论,《新疆日报》总编辑吕器就被撤了职。

张治中先生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作了诸多努力,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方面来归纳:

(一) 切实增进中苏亲善

张治中为增进中苏亲善,做的比较大的工作有:

1. 协助苏联运回存放在猩猩峡、哈密物资。抗战中,苏联是最早援助中国的。苏先后向中国提供 2.5 亿美元(利息为 3%)的易货援助贷款,用于从苏联购买军火物资,并派遣了 3000 多名军事顾问及技术专家,还有数百名空军志愿飞行员。这对中国初期抗日战争是极大的支援。根据两国协议,中国用农副产品及部分战略物资偿还苏联贷款。但是,由于盛世才的反苏政策,大约 3100 吨物资,有钨、锡、羊毛、羔皮等,存放在新疆的猩猩峡及哈密两地。新疆和平条款签订后,苏方正式提出要求将这些物资运走。张治中当即欣然同意,答应给以最大的协助。他指示恢复沿公路各站汽车队人员的住食设施,妥善招待苏方驾驶员。苏方对新疆方面的大力协助甚为满意。这为新、苏关系的进一步缓和打下了基础。

2. 签订中苏航空协定。1939年9月,中苏两国在重庆订立协定,建立哈密至阿拉木图(途径伊宁、迪化)定期航线,组建中苏航空公司。协定有效期 10 年。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重要航线在抗战中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48年4月,国民政府认为这个航约是“开门揖盗”,借口航线赔钱,主张航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即废除。张治中在接到政府上述电文后,反复考虑,认为应该从中苏关系和新疆局势着眼,航约不应该废除,只能在原约基础上调整。他很客观地分析道,在需要合作时请人家来,不需要时一脚踢开,单独对苏废约,对苏刺激太大,后果一定不好。张治中多次电报返往南京,最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听取了他的意见,采取折衷办法:先废旧约,再另订新约。最后中苏航约又延长了 5 年。

3. 撤销“归文会”。“归文会”是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的简称。“归化族”是指苏十月革命后对新制度不满逃到新疆的俄罗斯人及其后裔。以归化族命名就是不承认他们是俄罗斯族。苏联政府对这个命令和“归文会”的存在非常不安,驻迪化领事一再提出请求撤销“归文会”,张治中立即同意,并赞同另组“苏侨协会”。

4. 阻止美军用飞机到新疆“游览”及对北塔山事件的处理。1946年夏的某一天,张治中忽然收到国防部电报,称有美军官数人乘军用运输机来迪化游览。他立即意识到这对新疆局势有不利影响,马上复电阻止。但是,美机已到。此事果然引起苏联领事馆的怀疑。张治中当时就表示: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情,苏方才释然。北塔山,位于中蒙边境,外蒙独立后这里国界划分尚未定案。1947年夏,反复多变的阿山专员乌斯满因为暗中投靠国民党,伊宁方面不满,民族军与之展开激战,乌斯满率部逃往属阿山地区奇台县境内的北塔山,曾抓获蒙兵 8 名。当时驻扎北塔山边防的为国民党军某旅的一个连,连长为马希珍。在中方放回捕获的蒙兵后,6月5日马希珍连受到“涂有苏联徽号、标帜”飞机的轰炸(苏蒙两国飞机标志很相似),双方经过一场战斗,部队脱离接触,事态逐渐平息。但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迪化分社却发出了一个夸大其辞、耸人听闻的消息,证实确有“苏联飞机四架轰炸我驻军……外蒙骑兵已侵入新疆境内 600 余华里……”^⑩。此消息一传到内地,便被正寻求反苏材料的国民党宣传机构大肆渲染,各报竞相转载。国民政府外交部不由分说电令中国驻苏大使向苏联并通过苏联向蒙古提出严重抗议。张治中以为这只是个局部冲突,事态不宜扩大,将事件经过致电蒋介石、行政院和外交部,说明中央社所发消息不实。北塔山事件后,6月12日深夜,张治中接到电报,一向以反苏反共出名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要为北塔山事件专程来新疆考察。张治中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使白在上飞机前几分钟取消了此行。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上次美军用飞机到迪化,已引起苏方怀疑,现在再来一个反苏反共的国防部长,岂不是火上加油?……要增进中苏亲善,就不能不坚决反对在新疆制造反苏局势”^⑪。

(二) 促进中苏经济合作

张治中认为要增进中苏亲善，不能光靠口号，一定要有具体的措施，其中主要是要恢复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过去新疆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是靠从苏联进口的大批物资支撑着的。由于盛世才反苏，苏制商品断绝。张治中一上任，便为恢复对苏贸易作了各种准备。首先是清理了裕新土产公司（盛统治期间新疆专营对苏贸易的机构）旧帐，以便交涉结案。1946年5月成立省企业公司，为新、苏贸易恢复做好了组织准备。同年8月，张在视察伊犁时与苏驻当地领事达巴森多次会谈，希望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双方经贸关系。11月4日，他向苏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耶夫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至于新疆经济建设方面，张治中认为，也非得到苏联人才技术和设备的支持不可，要把盛世才反苏撤走的人员及设备，再“请”回来。他在和平条款签字后就着手研究、拟定条约初稿，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后即向苏方提出，后经多次谈判，其间又经历种种挫折，虽被国民政府中央最终否决，但协定（内有贸易、有色稀有金属开采、采油等内容）成为1951年、1952年毛泽东访苏，和苏联签订的有关经济合作协定的蓝本。

（三）发展中苏文化与学术关系

张治中在这方面具体抓的一件事是：恢复迪化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以孙科、邵力子为正副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过去在迪化也有该组织的活动，因盛世才反苏而陷入停顿。新疆和平条款签订后，张治中就建议恢复该组织的活动。他亲自担任会长，请苏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耶夫做副会长。张治中非常关心会址的落实、理事人员的选定，提名本地一些著名亲苏派人物担任协会的理事，如阿合买提江任副理事长，屈武、阿巴索夫担任正副秘书长。1946年10月22日，迪化中苏文化协会正式恢复。协会经常放映苏联电影，举行各种展览会、讲演会、开设俄文班……。这些活动，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的生活，尤其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张治中先生实行亲苏政策很快得到苏联朋友的信任，迅速扭转了盛世才统治后期造成的中苏在新疆的严重对峙局面。张治中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及中苏友好的主张，表明了他是有政治远见和经验的政治家，尤其是他对新疆国际环境的分析及理解，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注 释：

- ① 新锡公司：苏在新疆设立的考察、开采锡矿及副产矿物之托拉斯，简称新锡公司。锡矿条约是1940年11月苏驻新总领事同盛世才秘密签订的，条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其中有：新疆政府给予苏特殊权利，将锡矿及副产矿物的制成品无障碍运出，免缴关税；新疆政府保证“新锡”所需之地，居住在划拨“新锡”域内的居民，一律迁出。新锡公司有权设立自己的武装守备。参见夏林根等编《中苏关系辞典》，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 ② “清枪”、“献马”：早在1932年，盛世才就下令收缴牧民用于生产及自卫的枪支。“清枪”运动在全疆尤其是阿山地区一直引发着不断的武装反抗。1943年，盛又下令强迫主要是伊犁、塔城、阿山的广大牧民给国军捐献军马一万匹，称之为“献马”运动。
- ③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委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 ④ 19世纪帝国主义在中亚进行殖民侵略时，从语言和地理概念上把泽拉夫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新疆地区称为“东土耳其斯坦”。这一名称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一直用来在新疆进行分裂活动。“三区革命”时，在1944年11月12日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新月。“三区”代表同国民党谈判，体面地宣布撤销这个名称。
- ⑤ 包尔汉著：《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 ⑥ 张治中：《我的真实的解答和严正的劝告》，载1946年11月20日《新疆日报》
- ⑦⑧⑨⑩⑪《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444 470 526~527 532 533页。